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HUANGZHONG(Journal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Chin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1)04－0323－07

宫宏宇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缩微胶卷资料初探

摘　要:唱赞美诗不仅是基督教礼仪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教会活动和教会学校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有关中国赞美诗的研究的研究都还谈不上深入。对原始资料的认识不足是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缩微资料做一初步研究,除介绍这些资料外,还旨在指出其中一些赞美诗在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价值。

关键词:赞美诗;哈佛－燕京图书馆;《颂主诗歌》;记谱法 ;西乐东渐

中图分类号:J605-0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44

引　言

从公元七世纪聂斯托利派进入中华国土开始,通过赞美诗与歌咏来传播福音就成了来华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①。唐元时代流行的景教歌咏仪式和明末传来的天主教弥撒音乐不算,仅十九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传来的赞美诗就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从1818年新教来华第一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934)《养心神诗》的出版,到1936年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普天颂赞》的问世,先后出版的基督教新教赞美诗达两百多本[1](第487－519页)。唱赞美诗不仅是基督教礼仪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教会活动和教会学校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俱乐部、青年会、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戒酒会等教会学校所特有的课外组织都牵涉到唱歌活动。此外,教会学校维持纪律、校间交流也常常是通过作祈祷唱赞美歌进行的[2](第14－15页)。虽然赞美诗在基督教在华事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国内赞美诗的收藏却有限。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国音乐书谱志》中的前期部分(先秦——1911)只录有来华浸信会所编的《赞主诗章》(1875刊本)、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编的《小诗谱》(1883刊本,1901重校石印本)和伍德洛夫(A. Woodruff)著的《公赞诗》(1908上海美华印书馆)四本。后期部分(1912——1949)也仅有55本。资料的缺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研究的肤浅和片面性。有关中国赞美诗的研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谈不上特别的深入。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此种状况虽有所扭转,但细观近几年国内外发表的论文专著以及各院校的博硕士论文,关注基督教音乐当代发展的地域性的个案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②。研究人员也多为教内人士,除神职人员盛宣恩[3]、王神荫[4-5]、陈伟[6]和谢林芳兰[7]的著述外③,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历史性地追溯赞美诗在中国发展演变的著述并不多④。其中原因颇多,但对原始资料的认识不足是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就目前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缩微资料做一简述,除希望把这些资料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外,也旨在指出其中一些赞美诗在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史上的价值。

一、哈佛－燕京图书馆

在谈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男,奥克兰大学哲学博士,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就学于武汉音乐学院。后入奥克兰大学研究汉学,自1997年起在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任教。

收稿日期:2011-04-20

新教赞美诗集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哈佛—燕京学社及所属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虽位于哈佛大学校园内,与哈佛大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其在法律上与财政上均是独立的。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其宗旨为促进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该社以关注传统汉学研究为焦点,与1955年成立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称"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后者是海外中国研究中心,以地域研究与近、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为著。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与费正清中心仅一街之隔。原名"汉和图书馆",后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虽然成立于1928年,但该馆的收藏可以追溯到1879年,也就是哈佛把中文课列为学科之一的那一年。因为在那年波士顿的几位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商人集资请宁波文人戈鲲化(1838—1882)来哈佛教授中文课⑤。戈鲲化随身携带的一部分汉文书籍也就成了哈佛大学最早的中文收藏。三十五年后,即1914年,日本新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服部宇之吉(1867—1939,此君曾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又在京师创办女学堂)和姉崎正治(1873—1949)到哈佛讲学,他们也向哈佛大学图书馆捐赠了一些日本出版的重要的汉学及佛学书籍。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这些收藏(汉文4526册、日文1668册)被转到新成立的"汉和图书馆"。当时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且已开始对这些资料编目的藏书家裘開明被任命为图书馆长(以上资料采自哈佛大学官方网站)。该馆是全美国中文书籍收藏中仅次于国会图书馆的地方,善本书珍藏尤其多。现有藏书共一百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占一半以上。中文藏书中,二十万册是古籍。包括宋、元、明刻本1500余种,清初至乾隆间刻本2000余种,其它抄本、原版方志、拓片、法帖等也数千种。除中、日文外,该馆还收有藏文、蒙古文、满文、韩文、越南文资料。所收藏的微缩胶片达八万多件,期刊5700多种,报纸32种。这些资料虽以汉学的传统资料为主,但也包括中共党史和国史资料,大陆出版的新地方志等[8-9]。

善本书外,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早期中文基督教书籍也是全美数一数二者。特别是十九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广东、澳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或用中文撰写的基督教著作,可以说是世界上收藏此类著述最丰者。

二、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基督教新教赞美诗集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最早的基督教赞美诗缩微资料是《续纂省身神诗》和《养心神诗》。此两部赞美诗集都不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印自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藏板和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石印版。前书由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出版,含有54首前所没有翻译过的圣诗[7](第10—11页),采用律诗体翻译。全书19叶(每叶为正反两页),开本尺寸为25厘米,封面上有"道光十五年(1835)重镌"之字样。(香港浸会大学也收有此诗集缩微资料)。后一书虽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所编,但封面署"尚德者纂"。未署具体的出版日期,但应是在1843年麦都思代表伦敦会到上海之前出版无疑。谢林芳兰在其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基督教赞美诗史》中把此书的出版日期标为"1838"。此书篇幅较大,共有46叶,开本尺寸为20厘米。其中绝大部分(64首)译自有英国赞美诗之父之称的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1674—1748)的诗作、九首译自英国浸信会牧师约翰·吕本(John Rippon,1750—1836)、一首取自最早出版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欧尔尼赞美诗集》(*The Olney Hymns*),还有一首出处不详。麦都思的《养心神诗》后经王韬(1828—1897)加工润色后,于1856年改名为《宗主诗篇》,在上海重新出版[7](第13页)。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五口通商后所出版的新教赞美诗集有:咸丰2年(1852)出版的《赞美诗》、葉韙良(William Young)的《养心神诗新编》和英国长老会宾威廉(William C. Burns,1815—1868)的《神诗合选》。《养心神诗新编》为厦门花旗馆寓藏板,开本尺寸为23厘米,10叶,内含13首厦门方言圣诗。原件与《神诗合选》合订在一起。据约翰·朱理安(John Julian,1839—1913),葉氏是第一个成功地用厦门话编纂赞美诗的传教士(Julian 1985:744)。葉韙良(也称杨威廉、养威廉)原是美国浸礼会派驻暹罗(今泰国)的传教士,在来华之前,他曾在新嘉坡、曼谷等地华人中传教,并曾于1840年在曼谷出版过一本《祈祷神诗》(王神荫 1950)。葉的《养心神诗新编》后由1846年到厦门的伦敦宣道会的施敦力亚力山大(Alexander Stronach,1800—1879)于1857年增扩为58首,但仍称《养心神诗新编》。宾威廉的《神诗合选》也是厦门花旗馆寓藏板,1854出

版。23 厘米,篇幅为 30 叶。1847 年来华的宾威廉是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他先后在布道的地方有香港、厦门、上海、汕头、福州、北京等地[10]。《神诗合选》中的圣诗有的选自麦都思 1838 年的《养心神诗》,有的选自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42 年在马六甲刊印的《养心神诗》,但均有细微的改动[7](第35页)。早期传教士中,宾威廉是努力提倡方言文学最盛者,每到一处就用该地的方言译诗。他出版的诗集除《神诗合选》外,还有《潮腔神诗》(汕头土语,1861 年出版,29 首)、《榕腔神诗》(福州土语,1861 年出版,30 首)、《厦腔神诗》(厦门土语,1862 年出版)等。下节所述的北方官话《颂主圣诗》中就有 30 多首是他的遗作。1936 年出版的《普天颂赞》也收有他的赞美诗[4]。

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收藏了不少 1860 年之后编辑的方言和白话赞美诗集。如《赞美神诗》(双门底福音堂翻译,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86—?)、《耶稣教圣诗》(天津:耶稣堂存板,1862)、《榕腔神诗》(福州:美华书局活板,同治四年[1865])、《榕腔神诗》(榕城[福州]:福音堂藏板,同治 9 年[1870])、《宗主诗章》(福州:福音堂救主堂鉛印,同治 10 年[1871])、《童子拓胸歌》(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同治 10 年[1871])、《颂主圣诗》(京都[北京]:美华书院刷印,1875)、《谢年歌》(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光绪元年[1876])、《宗主诗章》(福州:美华书局活板;美部会印,光绪 17 年[1891])、《救世教诗歌》(福州:美华书局活板,光绪 23 年[1897])、《月季歌》(福州:金栗台存板,18—?)、《福州奋兴会诗歌》(福州:罗马字书局活板,光绪 32 年[1906])、《赞主圣诗》(福州;罗马字书局活板,光绪 32 年[1906])、《颂主圣诗》(圣公会译,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18)。

这些早期出版的基督教赞美诗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有词没有歌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与我们研究赞美诗传入的音乐无关。因为有的圣诗集在歌词旁边标有所唱的曲调的标题,这种做法与我国戏曲唱本中所标的曲牌差不多。通过所提供的曲调标题,研究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出应用的曲调。如韩国鐄先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图书馆见到的《颂主诗歌》1877 京都灯市口美华书院版和 1905 年汉口圣教书局,汉镇英汉书馆版就没有乐谱,只有押韵的中文赞美诗,但书后有英文说明及引得,英文部分的索引部分也有“乐调引得”,列举当时通行的数本有谱的西洋赞美诗谱集,指引唱者某首中文诗可配某首西洋调。特别指出中文平仄不易配合西调[11](第3—7页)。据台湾学者江玉玲的研究,麦都思 1858 年的《养心神诗》中的每首赞美诗除注明出处外,还有均标明诗节号码以及每首都附有小标题等特点[12](第39页)。由此可见,即使只是歌词的赞美诗集,也可推断出当时所用的音乐。这种有歌词即可知音乐的现象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在大洋洲等非西方社会也都有惯例[13](第91页)。

三、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不同版《颂主诗歌》

《颂主诗歌》是在华各宗派协作出版《普天颂赞》以前流行最广的一本赞美诗集,原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汉理(Henry Blodget, 1825—1903)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共同编辑,1872 年由华北公理会出版。柏汉理负责文字,富善主管音乐。所以该诗集也以其英文名 *Blodget and Goodrich Hymnal* 著称。柏汉理,也称白汉理,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4 年到上海,随后又到天津和北京传教凡 40 年。富善毕业于威廉斯学院,后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865 年到中国,主要在华北地区宣教,并在通州设立了公理会神学院。由于富善精通希伯来文等各国文字,中文造诣也深,1891 年,他与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等来自各宗派的数位宣教士一起被任命为《圣经和合本》的修订委员会的成员,此译本成为华人教会最普遍使用的圣经译本。富善擅长音乐,是最早呼吁音乐在传教事业中重要性的传教士之一[14](第221—226页)。富善和柏汉理两人所编的圣诗达 300 多首,于 1895 年增至 408 首,在北京出版,1900 年再版,可惜全书印成之后,就遇到庚子年的义和团事件,全部新书和铅版都被烧掉。以后于 1907 年在日本横滨出版,计有五种不同的版本。以后 1925 年,1929 年又在上海美华书馆重印,1933 年又在天津工业印字馆印镌[4]。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颂主诗歌》的版本颇多,仅京都(北京)美华书院刷印的版本就至少有:1880 版本(开本尺寸 21 厘米)、1887 版(开本尺寸 23 厘米,共有圣诗 315 首,三一颂 10 颂,歌咏文 12 段,卷末页 368—384 还附有圣教择要礼文学[婚姻简礼文、殡葬礼文]及敬主文式)、1891 版(开本尺寸 14 厘米,共有赞美诗 358 首,三一颂 11 颂,歌咏文 12 段;诗 316—358 首,附在歌咏文之后,即页 293—331)、1895 版(开本尺寸 22 厘米,共有诗 375 首,三一颂 11 颂,歌咏文 12 段)。在日本横滨市印鐫的也至少

有1895、1907、1911、1914、1915四种版本。1895版开本尺寸22厘米,有赞美诗400首,三一颂12颂,歌咏文13段,附英文序及索引。1907版开本尺寸2厘米,篇幅稍大,共有诗408首,歌咏之文14篇,三一颂12颂。附英文序及索引。哈佛毕业后即来通州协助潞河书院的都春圃(Elwood G. Tewksbury, 1865-1945)参与了此版的音乐编纂工作。1911版內容虽与1907版大致相同,但在诗第一首之前均用中文加总题目录及首句目录。1914年版基本上与1907年版同,共有诗408首,歌咏文4段,三一颂12颂,有总题目录及首句目录。1915年由横滨福音印刷合资会社的铅印版有总题目录首句及英文序、索引4种及诗译者名单。此书前部分与《颂主诗歌》1914年版之后部分及《颂主诗歌》1914年版同;后部分与下面将提到的《(新增)颂主诗歌》之前部分同。

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收藏还收有通州潞河书院1895印行的《颂主诗歌谱:音乐嗖法》(此版封面有"此嗖法诗谱与公理教会新印出颂主诗歌之韵调谱同"字样,开本尺寸为24厘米,68叶,都春圃编)。此外,上海美华书馆摆印,民国11年(1922年)的《(新增)颂主诗歌》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行列。(香港浸会大学也收有此诗集缩微资料)。此书第409首至452首有乐谱,与《颂主诗歌》1915年版之后部分相同。

哈佛—燕京图书馆之所以收有如此多《颂主诗歌》版本,除了此赞美诗集流传广、发行量大、版本易得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出自美国公理宗牧师之手。而公理宗的档案资料,哈佛—燕京图书馆收的最全。成立于1810年的"美国公理会海外宣教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缩写为ABCFM,中文译为"美部会"、"公理会"或"纲纪慎会")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搜集了大量由基督教传教士撰写和翻译的中文著作,并将它们运回在波士顿的办事处。1949年和1962年该会两次把这些资料捐献给哈佛大学,手稿和中文图书分别由候顿图书馆(Houghton Rare Book Library)和哈佛燕京学社保存,图书时间大约在1810至1927年间[15]。

四、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有谱赞美诗集及其编纂者

对研究中西音乐交流的人来说,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中最有价值的是几部有乐谱的赞美诗集。这几部分别为美国浸礼宗传教士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 1817-1887)1856年编辑的《赞神乐章》、美国长老会应思理(Elias B. Inslee)1858年出版的《圣山谐歌》、1871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的榕腔《童子拓胸歌》、1876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印的《谢年歌》、1877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的《福音赞美诗》、通州潞河书院1895印行的《颂主诗歌谱:音乐嗖法》以及福州罗马字书局1906年印行的《福州奋兴会诗歌》和《圣诗乐谱》。这几部赞美诗集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传教士所教授的音乐,对他们所采用的乐理体系也可略见一斑。

罗尔梯鸦片战争后来华,先是在香港,宁波开埠后,他于1847年6月到宁波,与第一个来宁波传教的美国浸礼宗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 MacGown, 1815-1893)一同工作。他的《赞神乐章》编辑于1856年,开本尺寸为23厘米,页数不多,只有25叶,有赞美诗24首,加总赞词。其中赞美诗音调用五线谱,歌词既用汉字也用罗马拼音宁波方言。中文用文言文。歌词不是直接列在乐谱(四部和声)之下,而是与歌词分列。左边印乐谱,右上边列汉字歌词,右下方列罗马拼音宁波方言。此书可能是新教在华出版的最早的有谱赞美诗集。

与罗尔梯的《赞神乐章》相比,应思理的《圣山谐歌》的篇幅要大一些,开本尺寸为18厘米,内容也丰富些。除了赞美诗72首之外,还用了五叶的篇幅介绍简单的西洋乐理。同为美国人的应思理属于不同的教派,要比罗尔梯稍晚一些。他1856年受美国长老会外国差会派遣来上海,后来有被转往宁波。因为与差会有摩擦,1861年美国差会终止了他的任命。应思理不得已举家回美,但三年后受朋友资助作为独立传教士再次来华传教,也曾短期地隶属于伦敦传教会。这次他选择的传教地点是杭州,除办学外,他还编辑《中西学报》。1867年他与美国南长老会接触,同年6月被派赴华,所以,他也被称为第一个被美国南长老宗派到中国的传教士[16](第31-32页)。他的工作后来由司徒雷登的父亲接任[17](第12页)。他的《圣山谐歌》是他在宁波传教时编纂的,由宁波华花书房(上海美华书馆的前身)于咸丰8年(1858)刊行。与罗尔梯的《赞神乐章》一样,《圣山谐歌》其中的72首赞美诗均用文理和拼音化了的宁波话。但与罗尔梯不同的是,汉字和拼音歌词是印在歌谱下的。汉字印在第一声部旋律下,罗马字母翻译的宁波方言印在第二、第三声部的音符下面。

《圣山谐歌》中教基本乐理的方法也值得注意。与稍后英国长老会的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的《养心诗调》

(1868年刊行于厦门)相比，应思理直接用的是五线谱。而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养心诗调》、《乐法启蒙》、《乐理颇晰》)采用的却是经过改动的Tonic Sol－fa记谱法，直到1870年后，杜嘉德出版的《西国乐法》用的才是五线谱。[⑥]应思理介绍了五线谱的唱名法，用“佗、雷、米、法、琐、拉、西”代表大调音阶的七个音，与狄就烈(Julia B. Mateer，1837－1898)1872年在《西国乐法启蒙》中所采用“多、类、米、乏、所、拉、替”的汉语音译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其他音乐术语的翻译上，应思理除用“全备、半开、四开、八开、十六开、卅二开”来分别表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用“歇”来代表“休止符”外，还介绍了升降号、表情符号等。应思理1868年初在杭州办男女书塾时，都曾设立过音乐课程[18](第96页)，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这一诗集曾被用作教材。

赫理美(Benjamin Helm，1844－?)编辑的官话本《福音赞美诗》是为学校编纂的，内含101首圣诗和福音歌。编辑体例以长老会主日学校赞美诗集为原型。赫理美也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1868年与司徒雷登的父亲一起到杭州传教。1878年因健康缘故返回美国。据说赫理美是“中国最流行的圣歌”“耶稣爱我，我知明”的歌词翻译者(由司徒雷登的妈妈配歌)[16](第148页)。他在办男童中学时，常常教授学生唱圣诗。也许是来自同一国度(美国)和同一教宗(长老会)的缘故吧，此歌集与和狄就烈的《西国乐法启蒙》很相似，除教授学生用的乐理常识《乐音问答》(musical catechism)七课(由1872年6月到达杭州的A. E. Randolph太太编)外，其中所用到的语言(如把音阶翻译成“级子”)也与狄就烈的翻译相似。

四声部的《颂主诗歌谱：音乐嗖法》用的是首调概念的“Tonic Sol-fa”系统，但富善和都春圃的做法与杜嘉德在其乐理书系列中的做法不同，与英国浸礼宗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1883年在山西太原出版的教科书《小诗谱》也迥异。杜嘉德乐书所传人的西方乐理知识，有经过本土化了的“Tonic Sol-fa”系统，也有固定调的普通五线谱。李提摩太夫妇所用的则是融合和中国传统的“合、四、乙、上、尺、工、凡”体系和“律吕”概念的“Tonic Sol-fa”系统。来自美国的富善和都春圃采用的却是更正宗的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音乐嗖法”。这里他们直接用d、r、m、f、s、l、t来代表do、re、mi、fa、sol、la、ti。

福州罗马字书局1906年活板印行的《福州奋兴会诗歌》是福州三大教会所通用的赞美诗集，含圣诗114。这些圣诗不仅在复兴集会上唱诵，在其他教会场合也用到。同样是由福州罗马字书局1906年活板印行的《圣诗乐谱》有256首赞美诗，每首圣歌的开始都有歌调名和节拍名和四个声部的乐谱。

五、哈佛－燕京及国外其他图书馆所收藏有谱赞美诗集与十九世纪西乐之东渐

如果我们把以上所谈到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有谱赞美诗集和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所收藏杜嘉德1868－1870年的《乐理颇晰》(内含《乐理颇晰》、《养心诗调》、《西国乐法》)[⑦]、狄就烈1872年版《西国乐法启蒙》、韩国汉城大学图书馆所存狄就烈1879年版《西国乐法启蒙》、佛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所收武林吉夫妇(Franklin and Bertha S. Ohlinger)1879年的《凯歌》、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图书馆所藏湛约翰(John Chamlers，1825－1899)的《宗主诗章》等综合起来看的话，至少可以肯定以下几个事实：

一、从时间上来看，有乐谱的圣诗集的编纂可说是与新教传教士的来华是同步的。至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也就是传教士在被允许在内地传教前，新教传教士即已开始编辑出版有乐谱的圣诗集。

二、从流传的地域来讲，新教传教士所传入的基督教音乐在学堂乐歌兴起之前至少遍及华南、华北、华中、华东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新教传教士由唱圣诗所带动的音乐活动先是以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上海为中心，杭州、北京、天津、登州等地继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已波及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台湾的原住民也不例外[19](第207－209页)。

三、从传播的对象来讲，受赞美诗影响的除了普通的基督徒、教会学校的师生及与教会有关的人士外，还有教会医院的病人、普通的民众、士绅等。后者虽然人少，但也并非绝无仅有。李提摩太夫妇在山西赈灾时，李提摩太夫人在太原通常所做的事就包括“周三晚上开班教授那些有意学识谱的中国士绅朋友Tonic Sol-fa记谱法”[20](第152页)。此外，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教会合唱节对中国普通民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当第一届合唱节在福州开幕时，吸引的观众如此之多，当时“福州最大的可容纳2000人之众的教堂被挤的水泄不通。…在场的中国听众极为满意”[21](第423页)。

四、从传播的内容来讲，由传教士传入的记谱法多种多样。这与学堂乐歌以简谱为主的做法大不相同。较早的此类诗谱，如罗尔梯的《赞神乐章》(1856)、应思理的《圣山谐歌》(1858)、范约翰夫妇合作的《曲谱赞美诗》(1868)等用的是传统的五线

谱[22]。而同时出现的天主教的《圣事歌经简要》(1861)用的却是五线谱前身的四线谱。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一书的初版(1872)和二版(1879)用的也是普通的五线谱。赫理美的《福音赞美诗》(1877)亦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源于英国的 Tonic Sol-fa 也开始在中国各地流传。虽然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最早的首调唱法的 Tonic Sol-fa 赞美诗集为通州潞河书院 1895 刊印的《颂主诗歌》,但有证据表明此法不仅早在 1858 年就被传入中国,而且流传很广。早在 1867 年传教士帅福守(Edward W. Syle, 1817－1891)在一封反驳香港一位外籍人士武断地说中国境内没有音乐教学活动的信中就曾明确地提到"早在 1858 年他们【按:宁波长老会】就出版了一本有二百五十首曲调的圣歌集,其中用到 Tonic-sol-fa 记谱法"[23](第28页)。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1861－1863 年在香港和北京都曾教授过这一方法[24](第332页)。1868－1870 年来自苏格兰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率先用华化了的 Tonic Sol-fa 法为《养心诗调》配乐。李提摩太 1876 年夏和 1877 年春在山东青州办孤儿院时曾有系统的教过 Tonic Sol-fa 记谱法[20](第110页)。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就连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普遍采用 Tonic Sol-fa 教学法[25]。即使是在学堂乐歌兴起后的上海,此教学法依然没有被淘汰。澳大利亚人艾美丽·巴顿(Emily Patton, 1831－1912)从 1901 年开始就穿梭于横滨与上海之间,办班教授此法[26](第40页)。十九世纪下半叶通过赞美诗集传入的记谱法还有十九世纪中叶才刚刚在美国开始流行的首调记谱法——形状符号谱。最晚在 1870 年代后期,形状符号谱就已引进到中国。因为福州美以美会武林吉夫妇 1879 年的赞美诗《凯歌》中就用到此记谱法[7](第41－42页)。1892 年狄就烈整编《圣诗谱》时,也改用此种记谱法。十九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不仅用五线谱、Tonic sol-fa 谱、形状符号谱,也有用工尺谱和中西合璧的工尺谱和五线谱。李提摩太夫妇在对中国音乐传统一无所知时,也主要依赖 Tonic Sol-fa 记谱法,但在接触到工尺谱后,他们就毅然决然地采用了 Tonic Sol-fa 与工尺谱、律吕谱结合的极具匠心的乐谱。其原因就是工尺谱是中国民间最广泛流传的记谱法,用的是汉字,中国人熟悉,学起来方便[27](第311页)。有曲谱圣诗集的出版,无疑促进了西方乐理知识在中国民众间的传播。

结　语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收藏赞美诗集无疑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的史料。其实,不仅仅是赞美诗,其他相关的史料仍然有很多保存在欧洲、美国的档案馆中等待学者们去挖掘。特别是像牛津、伦敦、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档案馆都有很好的收藏。一些不太知名的大学档案馆,也有令人惊喜的收藏。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如香港浸会大学,也有很好的收藏(如其中收藏的 19 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广东、澳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或用中文撰写的基督教著作就很值得查看)。再者,随着科技的发达,一些珍贵的史料,如由湛约翰编辑、广东伦敦教会藏版、光绪五年刊行的有谱赞美诗集《宗主新歌》都已经经过数码处理,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所藏的英国伦敦宣道会赞美诗收藏,也有许多可以在网上查到。即使是早期传教士的回忆录及著述也不再难以查找。连耶稣会士钱德明十八世纪原版的著述都可以查阅到。但遗憾的是,国内有些研究似乎不太注意对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在引述历史时,往往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学术繁荣"、"出版繁荣"后面的隐忧。

注释:

①关于景教圣咏音乐在中国的流传,可参见葛承雍《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 年第 3 期(总第 87 辑),157－178 页。

②如林键《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 160 周年(1847－2007)》(载《金陵神学志》2007 年第 1 期)、杨民康《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国内近几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也大都以地域性个案研究为主,如周晶的《兰州市基督教青年教会唱诗活动初步调查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5)、冯锦涛的《从国际礼拜堂看基督教音乐在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05)、王秀缎的《福州基督教会音乐与诗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6)、华慧娟的《基督教赞美诗在滇北苗族地区的传播、演变与文化意义》(西安音乐学院,2007)、李博丹的《中国朝鲜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地域性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09)等。国外有关研究可见 Samuel S. M. Cheung, "A Study of Christian Music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83" (D. M. A. dis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9). Maria M. Chow, "Reflections on the Musical Diversity of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usic in American Religious Experience*, ed. Philip V. Bohlman, Edith L. Blumhofer, and Maria M. Ch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87－309. Connie Oi－yan Wong, "Singing the Gospel Chinese style: 'praise and worship'" music in the Asian Pacific"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6)。

③谢林芳兰 2009 年曾在美国出版《中国基督教赞美诗史:从早期传教士到现代本土创作》(*A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From Its Missionary Origins to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Productions*)。关于此书,可见笔者所写书评,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页 140—144。

④当然也有例外,如加拿大学者 Vernon Charter 和 Jean DeBernardi 的研究即是一例。见 Vernon Charter and Jean DeBernardi,"Towards a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Processes of Musical and Cultural Synthesis",*Asian Music*,Vol. 29,No. 2 (Spring-Summer,1998),pp. 83—113。

⑤关于戈鲲化,可见王振中《戈鲲化的梅花笺》载《读书》2005 年第 4 期。

⑥关于杜嘉德,笔者曾专门著述,详见宫宏宇《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与西洋乐理之东传》载《音乐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⑦关于牛津大学所藏杜嘉德著述,可参见江玉玲《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中的音乐史料—浅谈杜嘉德乐理书的伯德雷恩藏本》载《台湾音乐研究》2006 年第 3 期。

[参 考 文 献]

[1]Sheng, David. 1964:"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D]. D. M. 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64.

[2]宫宏宇. 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J]. 音乐研究,2007(1).

[3]盛宣恩. 中国基督教圣诗史论述(1—8)[J]. 香港浸会圣乐季刊(1979—1983).

[4]王神荫. 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J]. 基督教丛刊》1950(26、27).

[5]王神荫.《赞美诗(新编)史话》[M]. 中国基督教协会,1993 年.

[6]陈伟.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3).

[7]Hsieh, Fang-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From Its Missionary Origins to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Productions*,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8]张效民. 美国的亚洲研究机构简介—哈佛—燕京学社[A]. http://icwar.bfsu.edu.cn/2009/03/495(2010 年 6 月 25 日登陆).

[9]朱政惠.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本营[A].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 年 11 月 21 日.

[10]McMullen, Michael D. *God's Polished Arrow*: *W. C. Burns*, *Revival Preacher* [M].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2000.

[11]韩国鐄. 早期西乐东渐佐证的发现[A]. 自西徂东》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第一集.

[12]江玉玲.《圣诗歌:台湾第一本教会圣诗的历史溯源》[M]. 台北: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

[13]Stillman, Amy."Prelude to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Protestant Hymnody in Polynesia"[J].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5 (1993): 89—99.

[14]Goodrich, Chauncey."Chinese Hymnology"[A].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221—26.

[15]赵晓阳.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汉语圣经译本[J]. 历史文献,2003(8).

[16]Woodbridge, Samuel Isett. *Fifty Years in China*. Richmond, VA: 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1919.

[17]Stuart, John Leighton.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18]Brown, G. Thompson. *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 *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 1837—1952.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7.

[19]Lee, Angela Hao-Chun."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al Control and Ear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on Music Education of Aborigines in Taiwan"[J]. *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23:2 (2006): 205—216.

[20]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6.

[21]Pakenham-Walsh, W. S."The Foochow Choral Union"[A]. *Chinese Recorder* 50: 6 (1919): 423.

[22]宫宏宇. 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圣诗谱》[J]. 中国音乐,2008(4).

[23]Syle, Edward."Music among the Chinese"[A]. *Dwight's Journal of Music*, 27. 4(1867): 28.

[24]Fryer, John. China [A]. *The Tonic Sol-fa Reporter* 143 (1864): 332—333.

[24]杨民康.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初探[J]. 中国音乐学,1990(4).

[26]Stevens, Robin S."Emily Patton: An Australian Pioneer of Tonic Sol-fa in Japan"[J]. *Research Studies in Music Education* 14 (2000): 40—49.

[27]Richard, Mary."Chinese Music"[A]. *Chinese Recorder* 21(1890): 311.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

(下转第 364 页)

[247](德)F·M·伽茨.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J].金经言译.文艺研究,2007(12).
[248]徐昭宇.我手写我史——2006年音乐美学专题笔会综述[J].人民音乐,2007(4).
[249]杨赛.从临响到直觉——论音乐美学的学科性质[J].人民音乐,2008(6).
[250]杨和平.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近代部分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8(3).
[251]王秀萍.从审美范式到反思性实践范式——历史视域钟的音乐教育范式转换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8(3).
[252]蒲亨强.论"韵"[J].中国音乐,2008(1).
[253]韩钟恩.声音经验的先验表述[J].中国音乐,2008(1).
[254]吴佳.康德《先验感性论》的音乐美学意义考掘[J].乐府新声,2008(1).
[255]陇菲."音心对映论争鸣"专题笔会印象[J].人民音乐,2008(7).
[256]刘名扬.浅谈中西音乐的审美差异[J].音乐探索,2008(2).
[257]韩钟恩.音乐美学基本问题[J].黄钟,2009(2).
[258]冯效刚.学人之思与学科之路——1978—2008中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管窥[J].黄钟,2009(2).
[259]宋瑾.冲突与选择: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不同价值立场[J].音乐艺术,2009(1).

责任编辑、校对:刘　莎

On Perceptual Experience and Rational Expression—60 Years of Research on Music Aesthetics in New China

YANG He-p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wa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music aesthetics, and it summarized and affirmed its theorical achievements in 60 years,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of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Chinese music aesthetics in 60 years, explored the new space for development of this subject, described and scientific 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Chinese music aesthetics, it was a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Chinese music aesthetics, development, introspection

(上接第329页)

Hymnbook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Collec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A Preliminary Study

GONG Hong-yu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AD, the Nestorian Christians into Chinese territory, that to spread the Gospel by hymns and singing songs were one of major works of missionaries in China. Onl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e the Protestant missionanes brought the hymns countless.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from *Yangxin shenshi* (*Edifying hymns*) published in 1818 by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the first person of Protestantism entered into China, to the *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 edited by the Union Hymnal Committee in 1936, it had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200 Protestant hymns (Sheng 1964: 487—519). To sing the hymn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ristian etiquette, it is also the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hurch activities and daily life for church school. The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d to the microform on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testant praise existed in Harvad-Yenching Library at present, in addition to wish to show the domestic academic information, with the other purpose of pointing out that some of the hymns be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usic exchan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Key Words: Harvad-Yenching Library in America, collec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Works in Chinese, microform, preliminary study